

# 黎族代表王国兴参加新政协

徐涛

1949年夏,海南黎族领袖王国兴应中共中央邀请,前往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共各地党组织的严密护送下,王国兴一路北上,最终安全抵达北平。

会议期间王国兴作为国内少数民族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民族政策的光辉成就,并激动地说:只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我们的一切权利,才会得到保障,我们的前途,才会光明灿烂。



▶ 王国兴

## 带领各族同胞反抗日伪顽

1939年2月日军侵略海南岛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等抗日武装奋起抵抗,但岛上的国民党顽固派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其军政首脑机关陆续退入白沙县。在白沙地区,国民党当局对当地黎族、苗族群众横征暴敛,并进行残暴的统治和压迫,还动辄以“通日”罪名展开迫害和屠杀,激起了黎族、苗族人民的极大愤怒。为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残酷暴政,黎族领袖王国兴挺身而出,决心带领当地各族同胞拿起武器反抗。

1942年,王国兴等以红毛乡为基地,进行起义的酝酿和串联工作。1943年春节前后,王国兴两次召开各乡黎族首领会议,决定于8月17日发动起义,并推举王国兴为起义总指挥。

8月12日,4000多名黎族、苗族群众率先在白沙一区起义,很快将国民党驻在白沙一区的军政机关和部队驱逐出去。

起义的消息传到国民党白沙县二区后,8月16日,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立即派人逮捕王国兴。王国兴被群众救出后,立即率领起义群众向当地国民党军政机关和驻地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

白沙县一、二区起义爆发后,各地黎族、苗族同胞纷纷起来响应。在为时半个月的时间里,参加起义的黎族、苗族群众达2万多人,驻在白沙县境内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和部队,几乎被全部驱逐出去。

一个多月后,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顽固派趁琼崖抗日军民全力对付日军“蚕食”“扫荡”之际,纠集兵力,分四路向起义群众发动反扑。王国兴率起义部队英勇抵抗,但因武器简陋、敌我双方力量悬殊而遭受挫折。王国兴遂率起义群众撤退到鹦歌岭和什寒山坚持斗争。

## 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0月,王国兴召集各黎族首领

开会商讨对策,提出:要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只有找共产党来帮助,得到一致同意。会后,王国兴派出多名得力干将外出寻找共产党武装。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寻找,终于和中共儋临联县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取得了联系。驻当地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四支队马白山、政委陈青山会见了他们,随即派支队政治处主任江田带领王文聪等人前往六岸山特委、总队部驻地。在这里,冯白驹等领导人亲切会见了他们,高度评价白沙起义,勉励他们继续坚持斗争,并提出立即派干部和武工队到白沙帮助开展组织、训练工作,再派部队帮助起义军反攻国民党顽固派。

随后,中共琼崖特委也成立工作委员会前往鹦歌岭。根据王国兴的要求,特委成立以黎族起义战士为核心的白(沙)保(亭)乐(东)人民解放团,任命王国兴为团长。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纵队(由独立总队改编而成)进入白沙后正确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受黎族、苗族同胞的爱戴和拥护。解放团在五指山区坚持与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国民党顽固派曾三次“围剿”鹦歌岭,但均遭失败。1944年12月,王国兴前往六岸山,会见了冯白驹。1945年8月8日,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王国兴任副县长,配合琼崖纵队开辟白沙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多次向白沙解放区进犯。王国兴迅速建立起白沙县猛进队、英勇队、区常备队、乡常备班、村后备队等武装,采取游击战术打击敌人,配合琼崖纵队粉碎敌人的“清剿”,进一步保卫和发展了根据地。

1949年6月,中共琼崖区党委和琼崖纵队决定:发动夏季攻势,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王国兴接到命令后,立即动员干部群众积极准备。28日,琼崖区党委书记冯白驹接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希望琼崖区党委从黎族同胞中推荐“一代表参加新政协”,并要求“如有适当人选,望即呈报姓名简历并准备经港赴(北)平”。

琼崖区党组织经过研究,推荐了王国兴。7月10日,中央电示:“同意派王国兴为黎族代表,望即设法派适当同志当翻译,护送他安全到港来(北)平”。

王国兴在接到通知后非常兴奋,恨不得立即启程。但在当时,海南岛和东南沿海部分地区仍然控制在国民党残部手中。敌人封锁了整个琼州海峡,雷州半岛沿海防卫森严,要渡海是相当困难的。为确保王国兴的安全,中共琼崖区党委经过研究,派出与王国兴共同战斗过的朱家玖护送他出海,并派新华社海南分社记者冯子平作为王国兴的秘书陪同北上。

8月初的一天,王国兴和朱家玖、冯子平从白沙出发,跋山涉水步行数日,来到儋县的泊潮村。在这里,临高县委派出的同志前来接应,负责派人护送一行人横渡琼州海峡。

天黑后,王国兴等人登上了一艘小渔船,悄悄驶入大海。王国兴虽然在海

南岛生活了几十年,却是首次出海。他毫无不适之感,反而非常兴奋。

一行人在海上漂泊了整整一夜,见到陆地的时候,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这时,前方岸上出现了敌人的巡逻队,正在他们预定的登陆地点巡逻。王国兴等人立即警觉起来,掏出武器随时准备战斗。船家也停止了划桨,小船随着海浪轻轻摇曳。不久,敌人巡逻队开走了,他们才乘隙立即登岸。在离安边不远处的小渔村里,王国兴一行人同前来接应的解放军粤桂边纵队联络员接上了头。

当时,粤桂边纵队正在与国民党广东、广西的保安部队展开激战。为了保证王国兴等人的安全,纵队派出了6名精干武装人员进行护送。王国兴等人跟随武装人员昼伏夜行,经过数日的跋涉,终于到达粤桂边纵队总部。纵队司令员梁广热情接待了王国兴一行人,并按照上级安排,为他们办理好了去香港的文件和手续,并派富有经验的地下党员护送他们前往香港。

王国兴等人进入香港,受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盛情招待。在香港,王国兴还见到了“老熟人”——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马白山是代表琼崖纵队赴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的。

3天后,在香港分局同志的安排下,王国兴、马白山、冯子平以及华南其他地区的赴北平各界代表20多人化装登上了一艘外国大轮船。经过数日的航行,轮船途经台湾海峡、东海和黄海,最后在青岛靠岸,受到山东解放区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部队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党政机关的安排下,王国兴一行人在山东解放区参观访问。几天后,一行人乘火车向北平进发。

## 参加新政协会议

到达北平后,王国兴被接到少数民族代表团驻地——民族招待所,他和杨静仁被安排在同一间房间。在北平期间,王国兴对组织上无微不至的接待非常感激。但他有吸竹筒烟的爱好,而他在海南的烟筒有碗口粗、一米长,因此无法随身携带。接待的同志得知后,立即派人到北平城内四处购买,但无结果,最后替他找到一件代用品——一个外形精美的铜制水烟袋送给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王国兴作为“国内少数民族”代表参会。其间,他认真参加了会议文件的审议,并用海南方言发言(冯子平担任翻译),他满怀激情地说:“共产党不但给我们田地,同时也分给我们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利了。我们只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我们的一切权利,才会得到保障,我们的前途,才会光明灿烂。”

在会上,王国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王国兴回到白沙县。当时,海南岛已经解放,白沙县政府举行群众大会。面对父老乡亲,王国兴激动地说:“今天解放了,我们黎族、苗族人民也站起来了,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翁了!”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九三学社

孟纬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孤守北平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已完全陷于绝境。在北平的九三学社成员积极配合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促进北平和平解放和保护学校、保护文化古物、迎接解放的工作。

当时,傅作义的挚友邓宝珊将军与九三学社许多成员有深厚友谊,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是中共地下党员,也与活跃在教育界的九三学社许多社员有师生之谊。九三学社通过这些关系,配合中共北平地下党做傅作义的工作。1949年1月16日,九三学社社员袁翰青等4位教授同北平10余名教授出席傅作义的宴请,就商谈北平和平解放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1月26日,九三学社负责人许德珩及樊弘、袁翰青、薛思、劳君展、黄国璋、俞平伯、方亮、鲁宝重、楼邦彦、王心正、孟昭威等,以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名义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同日,又以九三学社名义发表了宣言。

第二天,许德珩、张奚若等在共产党人徐冰(当时正在参加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的指导下,约请北大、清华大学的著名专家、教授开茶话会,并请董必武到会,为与会者讲解了中共的思想政策。

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傅作义衡量再三之后,决定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进驻



## 刘宗宽:解放西南战役中的“潜伏”功臣

乔育新

刘宗宽青年时期立志报国,参加了杨虎城部队,经杨虎城将军推荐,先后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和陆军大学特二期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宗宽任暂编第十五师师长,奉命率部奔赴抗日前线,却屡遭国民党“中央军”将领的排挤、诬陷。1943年,刘宗宽秘密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1945年初,周恩来在重庆宴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刘宗宽也应邀参加。在交谈中,周恩来精辟的谈话和崇高而亲切的形象,给刘宗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胜利后,刘宗宽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党的统战工作,并向叶剑英、王炳南等中共领导人汇报过工作。

1946年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刘宗宽准备脱离国民党阵营前往延安,经中共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建议留在重庆,担任重庆行营参谋处处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谋处长、中将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等职务。其间,他对爱国民主活动和民主人士进行掩护,并通过郭则沉将一批重要军事情报转交给中共。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并分路追歼国民党残余部队。刘宗宽利用自身有利条件搜集了大批军政情报提供给中共地下党组织。5月,中共资深情报员房显志、黄克孝到重庆,并以“客

人”的身份住进刘宗宽家里。刘宗宽陆续将国民党西南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备、军队素质、武器装备及指挥官的特点及军队部署等详细情报提供给两人,再由两人设法转送解放军。

1949年8月,解放军积极准备发动解放西南战役。战役开始前,为了迷惑敌人,解放军佯攻秦岭、威逼大巴山,造成通过两地进击四川的声势。刘宗宽在房显志的帮助下,精心把北线解放军的佯攻作战计划制成“准确情报”,源源不断提供上去,致使国民党高层发生错误判断,把胡宗南集团的重兵集结在秦岭、大巴山一线。

11月,蒋介石终于察觉到解放军由鄂、湘西进川、黔,迂回重庆的战略意图后,慌忙下令秦岭、大巴山的守军南撤入川,并下令紧急抽调800辆汽车将胡宗南部的国民党第一军赶回重庆加强防卫。刘宗宽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与房显志商量,决定派王昆山将情报送出。为了保证王昆山安全通过道道关卡,刘宗宽将王昆山化装成一个上尉军官,并为他准备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所有证件。解放军二野首长接到情报后,立即下令第三兵团主力部队飞速向重庆挺进,先敌赶到重庆,并于11月28日在重庆城外消灭了国民党第一军大部。30日,重庆解放。

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驻重庆后,二野首长亲切接见了刘宗宽,对他为解放西南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 民革领导滇黔人民自卫军举行反蒋起义

王晓旭

1948年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立后,一面积极参与策反瓦解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统一战线工作,一面秘密在全国多地建立起大小不等的数十支武装,准备发动起义。

民革成立后不久,领导人李济深派杨杰前往昆明主持民革在云南省的工作。其间,杨杰与万保邦会晤,希望万保邦组建一支武装,待时机成熟时发动起义,协助人民解放军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万保邦为滇军爱国将领,早年长期与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在抗战中屡建奇功。蒋介石挑起内战后,万保邦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愤而辞职,回云南家乡创办实业,振兴地方经济。会晤后,万保邦完全同意杨杰的主张,随即以准备参选国民党“国大代表”为掩护,在其长子万巨麟的配合下,发动秘密串联,在蒙自邀约文山、马关、屏边、金平、河口等地的亲朋好友组织队伍,准备反蒋起义。

5月,李济深又指派吴信达专程到云南与万保邦联系,并发给他“滇黔人民自卫军司令员”的委任状。此后,民革中央又从香港派来谭冬暮、张克明、许实等到蒙自会见万保邦,就时局

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交换意见。经过紧张的准备,1949年2月初,万保邦在蒙自芷村庄聚集起一支4000余人的武装,宣布成立滇黔人民自卫军(简称“民卫军”),万保邦任司令员,吴信达为政治委员,下辖9个支队。

“民卫军”在蒙自期白河大深沟伏击国民党军一个团获胜后,于2月28日公开发表讨蒋宣言,宣布起义,接着分兵夺取了新安所、碧色寨。起义军沿途散发《滇黔人民自卫军起义宣言》和《告云南民众书》,极大地鼓舞了西南人民的反蒋斗争,受其影响,滇东、滇西各地的人民武装也纷纷起义。

“民卫军”在进攻蒙自城失利后主动撤离,分成多支小队转移至山区开展游击战,继续与国民党周旋,并牵制了云南国民党军的主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

5月后,张克明根据中共中央南局和民革中央云南留守处的指示精神,秘密进入“民卫军”的活动区域,将分散活动的各游击队逐一编入中共滇桂边纵队。云南解放后,陈赓、周保中两位将军在昆明会见了万保邦,并任命他为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军事管理委员会委员。

## 武汉民建地下小组的成立和发展

贾晓明

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在重庆宣布成立后,1946年2月12日,民建总会在重庆召开第九次常务理事会议,决议推举周仲宣(周恒顺机器厂总经理)、施之铨(建国工业社社长)、朱楚辛(五丰面粉厂厂长)三人作为武汉推广会常务代表。三人均为武汉工业界人士,与武汉工商界有着广泛的联系。

1948年冬,施之铨在上海向民建总会负责人胡厥文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利用汉口市工业会“星六(星期六)聚餐会”为活动宣传阵地,宣传中共的工商政策,动员武汉工商界人

士认清形势,维持好生产,留在武汉迎接解放。为此,华煜卿、蓝昌农还写成《迎接大时代的到来》一文,秘密印发给武汉工商界代表人士,告诫大家“不要轻信国民党的谣言,不要盲目逃跑”。他们还与工商界人士研究了应对国民党强行拆迁甚至破坏机器的具体对策。这对稳定武汉工商界代表人士的情绪,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时,国民党武汉当局为了准备逃窜,经常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还发行所谓“珠宝奖券”“房产奖券”,企图强行摊派给武汉工商界人士,榨取钱财。民建地下小组立即联络武汉市商会、市工业会进行联合抵制,让敌人的“奖券”发行不能得逞。直到武汉解放,国民党的“奖券”仍被“完整保留”在市工业会。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日益逼近武汉,国民党军队企图作垂死挣扎,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在中共地下市委的领导下,湖北、武汉爱国进步人士及工商

界代表人士发起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推举张难先为主任委员。后改名为“武汉市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在武汉解放前夕维持全市的社会秩序。中共武汉市委由统战工作组组授安以该会常务身份负责联系推进工作。民建地下小组成员全部投入了该会工作——华煜卿任该会常委兼财务组组长;蓝昌农任总务组组长;贺尔梅派去市消防组织“公益联合会”,在武汉真空时协助纠察队维护治安;金斌斌参加了该会的联络工作。

民建地下小组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保护武汉水电燃料供应和电信通讯工作中作出了贡献。武汉水电供应除申新纱厂拥有少量发电能力外,全部由官僚资本宋子文主办的既济水电公司供应,为防止敌人逃跑前的破坏,民建成员华煜卿受中共地下党委托,利用同乡和朋友关系,成功地做好了既济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孙保基的工作。孙保基不但不随国民党逃

走,而且还留下来保护了工厂的机器设备,保证了武汉三镇的水电供应。

华煜卿等民建会员还利用社会关系配合中共地下党争取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煤矿总局汉口供应处处长盛希康和武汉市电信局局长尤其绍,从而完整地保存了这些单位的设备和器材,保证了武汉燃料的正常供应和电讯畅通无阻。

5月15日,国民党军队逃离武汉。华煜卿在沿江大道101号设立观察站,并在四维路、青岛路、宗关和花桥郊区设立4个观察点,派人监视敌军的撤退情况。午夜,华煜卿向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电话报告敌军已全部撤离。得到报告后,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立即通知民建地下小组和武汉治安委员会,请他们派人上街贴出安民告示和标语,并出动工人纠察队和起义投诚的警察以及消防人员,上街维护社会秩序,做好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的准备。

5月16日清晨,民建地下成员华煜卿、贺尔梅、蓝昌农、金斌斌以工商界代表身份,协助中共地下市委组织各界人士出城欢迎人民解放军。

武汉解放后,华煜卿、蓝昌农、贺尔梅、金斌斌公开了民建会员身份。中共中南局统战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领导看望了华煜卿等民建会员,感谢他们为协助武汉解放作出的贡献。1950年4月10日,民建总会决定华煜卿等14人为民建武汉分会筹备员。1951年8月5日,民建武汉分会成立。